

宋庆龄晚年的追求

捐献房屋、汽车和稿费

1928年,宋霭龄出资在庐山兴建一幢别墅,赠送给大妹宋庆龄,供她来山休息之用。宋庆龄在解放前曾三上庐山,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。1953年7月,她到江西视察工作,特地来到阔别18年的庐山旧居——河西路51A号私墅,看了后,满意地说:“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好。现决定从今天起,将此房交给国家,由庐山管理局统管。”翌日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,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。

接着,宋庆龄又在省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表示:“登山公路通车了,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,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,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,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山留下的纪念。”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中国救济总会,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,捐献给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,自己全靠工资生活。她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:“我愿将私宅、私车捐为公有,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。因为我有工资生活,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,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。”

享受“皇家”待遇,心不安

建国后,宋庆龄因生活、工作需要,常在上海、北京两地往来,而她是国家副主席,故在北京的时间较多。最初她的北京寓所是

在道路狭窄、环境嘈杂的方巾巷,中央准备为她新建住宅,她婉言谢绝,说:“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很多钱,我不能占用国家资金。”后来国务院于1960年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,那里虽然环境好些,但房子潮湿,导致她的关节炎经常发作。

鉴于此,尽管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,中央领导仍研究决定,破例为她新建一所住宅,并委托王光美将新宅设计图纸寄去上海征求她的意见。宋庆龄接信后,依然坚持不建新房,回信说:“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,为了我个人的住所而增加国家开支,这将使我感到非常不安。”

宋庆龄多次不同意建新宅,但中央考虑到她是古稀老人了,必须为她晚年着想,因此决定安排一所较幽静的花园式住宅给她。1961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在荒芜的旧王府,为她新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。当年宋庆龄就乔迁新居,在这里度过了她的七十大寿。周恩来日理万机,还如此关心她,使她非常感动。

然而尽管已搬进了新居,她的内心还是常常不安。1966年她给美国朋友格兰尼奇写信,回答是否迁入新址时,吐露了这样的心绪:“是的,我住在旧日醇亲王府花园里,溥仪就是在此

出生。我确实在享受‘皇家’的待遇,但我并不快乐,因为还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,现在仍住在简陋的小屋里。”宋庆龄在这寓所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20年。

贴心保姆,平等相待

早在1931年,19岁的广东中山县的女子李燕娥,因不幸婚姻离异后来到宋庆龄身边做保姆,一干就是50年。她比宋小19岁,一直忠心、精心照管宋庆龄的生活及家庭。建国后又竭尽全力照看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孙中山留下的遗物,宋庆龄称赞她是“不拿枪的警卫员”。

宋庆龄把李燕娥当作自己的亲人,同桌吃饭,唤她“李姐”,每次回上海,总是买些火腿、腊肠之类的食品带给她吃。1972年李燕娥60岁生日,宋庆龄托人买了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、2斤香蕉给她,向她表示祝贺。

1979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。宋庆龄万分焦急,亲自把她接到北京医疗,不但为她请最好的专家诊治,还抽时间陪她聊天,以减轻她的痛苦。在治疗过程中,还设法买些新鲜蔬菜、豆类 and 肉、鸡等食品,让她增加营养。她在给爱泼斯坦写的信里流露了极度忧伤的感情:“近日以来为李姐患的可怕疾病,而极感心烦意乱。她不仅是我的助手,更胜过我的亲人。”但是李燕

娥的癌病已经到了晚期,最后还是去世了。李燕娥的骨灰送往上海启程前,宋庆龄捧着骨灰盒,不停地用手抚摸,用脸亲吻,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欧美的“智慧相亲”大行其道

不久前在一个夜里,纽约公共图书馆举办一场讲座,主题是“女权主义的现代意义”。主办方没有想到,15美元一张的门票几乎很快被一抢而光。来听讲座的,很多是渴望结交异性的单身年轻人。30岁的音乐电视制片人保罗·托雷斯表示,在这种讲座上,他能了解未来“另一半”的思想。

这样的新风潮正在悄悄席卷美国东北部的一些中心城市,其中包括纽约、华盛顿和波士顿。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舍弃了聚餐和无聊电影,转而夜游博物馆,参加由鸡尾酒开场的辩论会和有关饮料供应、有业余乐队伴奏的读书会。在纽约,有语言天分的单身者甚至热衷于参加单词拼写比赛,以便引起异性的注意。

纽约公共图书馆系列讲座目前已经成了纽约“智慧相亲”的主要景观。两年前,讲座听众的平均年龄是68岁;现在,听众们平均41岁,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下降。

2002年,“智慧相亲”的概念首先在英国出现,源自一系列有名流参加的电视现场辩论会,论题包括“一夫一妻制毒害心灵”、“撒切尔夫人拯救了英国”等,影星休·格兰特就曾参与讨论。

去年,“智慧相亲”的节目形式传到纽约,由慈善家罗伯特·罗森克兰茨发起。保守派评论家莫妮卡·克劳蒂和风险投资家比尔·席格等都成为座上客,唇枪舌剑吸引了大批年轻人。

约中,中国文联组织的艺术代表团出访美国,精彩的节目一场接一场,颇受美国友人的欢迎。

在纽约的一场演出结束后,代表团全体成员又登上飞机,飞往下一站继续演出。飞机已经发动,马上就要起飞。此时,殷秀梅回头说:“黄宏,你的杂志看完了吗?借我看看。”

因为大家被安排在中间的座位,黄宏不能把杂志从其他乘客的头上扔过去。所以,他匆匆解开安全带,离开座位,把杂志送过去,又赶紧回到座位上把安全带系好。

此时,一个美国空姐带着一脸的怒气,朝黄宏冲过去。黄宏知道自己错了,起飞时不该离开座位,急忙向她赔礼。可无论怎么认错,空姐就是不依不饶地训斥。尽管黄宏听不大懂英语,但突然听到一个似是骂人的发音。他明白这是对中国人的无礼,甚至是侮辱,便气愤地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,向空姐做了一个开枪的动作。

空姐看到他的动作,脸色一沉,扭头就朝驾驶室走去。很快,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,接着,广播响起来:“因为飞机上可能有人员带枪,我们要停止飞行,进行检查。”

舱门一开,上来两名警察。在那个空姐的带领下,警察来到黄宏的面前。他们先向四周的旅客取证,然后对黄宏说:“这位小姐指控你携带手枪。”“你们的机场有安检,如果我身上有枪,我又是怎么登机的呢?”黄宏机智地反问。

他们考虑一下,又换一种说法:“那么,这位小姐怀疑你的精神有问题。”“进入你们美国时,我有健康检查证明。”警察回过神来,像是在劝说那个空姐。可是,那个空姐还是不肯就此罢休。最后,警察又对黄宏说:“你刚才用持枪的手势对准这位小姐,她指控你侵犯人权。”

事已至此,光靠愤怒和针锋相对已无济于事,黄宏灵机一动,说:“贵国尊重人权我早就知道,但是,每个国家有不同的风俗习惯。在中国,大拇指代表好,加上食指,就是八字,八就是发,我这个手势是向她祝福。”

警察听完后面忍不住想笑,扭过头去向那位空姐做

韩剧的构思,以简单明了取胜,即使篇幅很长、节奏很慢、波澜很多,在情节结构上还是简单明了的。相比之下,我们确实“构思过度”了。

这个问题,在社会生活中有广泛的普遍性。一个成功的大企业,它的经营模式一定是简单的;一个伟大的人物,他

在国内,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通过“相亲”的方式结识、相恋并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与很多人的看法不同,“相亲”其实并不“老土”,在国外不少地方,“相亲”也依然是解决“个人问题”的一大途径,只不过外国人“相亲”的方式更加多样、更加有创意而已。

在韩国,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通过“相亲”的方式结识、相恋并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与很多人的看法不同,“相亲”其实并不“老土”,在国外不少地方,“相亲”也依然是解决“个人问题”的一大途径,只不过外国人“相亲”的方式更加多样、更加有创意而已。

构思过度

余秋雨

际关系一定是简单的;一个危机处理专家,他抓住问题核心的思路一定是简单的;一部划时代的著作,它的核心理念也一定是简单的。我们历史太长、权

谋太深、兵法太多、黑箱太大、内幕太厚、口舌太贪、眼光太杂、预计太险,因此,对一切都“构思过度”。很多中年人在不断提醒年轻人:生活比你想像的复杂得多。于是,年轻人的

目光也复杂起来;很多老年人在弥留之际告诉中年人:生活比你想像的要简单得多。但是,他体悟出这个道理的时间已经实在太晚。因此,可怜的人们,整个一生都在“构思过度”中度过,加添了多少破灭、纷乱和耗费。

摘自《沈阳晚报》

另类“相亲”

辩论之前,有一场45分钟的鸡尾酒会。辩论一开始可就没那么风度翩翩了。有一次谈的是全球变暖,结果演变为作家迈克尔·克莱顿和其他辩论者的骂战,这让一些听众莫名其妙兴奋。还有一次谈的是“美国是否宗教化了?”28岁的安迪·克里斯和他25岁的女友凯特·劳伯去听了,那是他俩第二次约会。克里斯回忆说:“辩论比我们想像的激烈得多,凯特和我的意见完全不一致。”在回家的地铁上,他俩辩论了40分钟。“这不是吵架,而是互动,分享思想,比出去看电影强多了。”

在過去的一年裡,美國的數十家文化機構瞄准市場需求,推出了針對“智慧親親”人群的活動。一些人尋找思想相近的另一半。2005年成立的“智慧连接”网站就是这样。到现在,该网站已经有了6000名会员。

韩国:电脑正在取代媒婆

如今在韩国,婚介所数量剧增。这些婚介所越来越依靠电脑给服务对象挑选合适的“另一半”。

韩国婚姻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喜吉表示:“电脑的眼光比媒婆强得多。”根据统计资料,媒婆在向相恋的双方介绍各自的情况后,答应见面的几率平均为12%。但如果通过电脑“匹配”,这一几率可以提高至22%。

韩国的善友公司就专门开发出了一套名为“协调对象系统”的软件。比如,一个名叫朴东一的男性,在善友公司的电脑上输入自己的条件——“首尔中流的S大学毕业、年薪3000万韩元、一般企业(30大企业外)白领、30岁”,然后是身高、体重、宗教,父母的职业……总共共有160多项。输入完毕后,电脑首先会显示朴东一在“婚姻市场”上的竞争力评分为71,随即会给出38位最佳“女性候

选人”,其中最合适的对象是一位现年29岁、毕业于大专的10级女公务员,年薪1800万韩元。如果朴东一把自己的职业改为专利律师,年薪改为7000万韩元,电脑立即会“改变态度”。这次介绍的女性年龄28岁,毕业的学校也改为首尔的中流大学,职业为大企业白领,年薪2600万韩元。

此外,在一些年轻人中,正在流行一种名为“007见面会”的约会方式。“007”是被人们广为熟悉的间谍代号,要求遵照上级指示行动。

在这种见面会中,男性按照指示穿着某种颜色的外衣,或手里拿着约定的物品,女性则在暗处观望,如果合心意就上前打招呼。其最大魅力在于,如果女性不喜欢,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走掉;男性却有被路人嘲笑

的职业改为专利律师,年薪改为7000万韩元,电脑立即会“改变态度”。这次介绍的女性年龄28岁,毕业的学校也改为首尔的中流大学,职业为大企业白领,年薪2600万韩元。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 zzwzbw1616@sina.com

有人说,他是楚辞专家,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,他就与郭沫若等人一起进行屈原诗歌的研究,并出版了著名的《屈原集》。

也有人说他是红学专家,因为他几十年来自潜心研究《红楼梦》,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。

而中医也是他的一专,早年曾在北京中医学院(现北京中医药大学)任教。

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,他的字体独树一帜,广受好评,备受青睐。

艰辛的童年

1910年,文怀沙出生在北京西城外鬼门关胡同的一户平民家庭,祖籍湖南。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,母亲在别人家做工挣得一些微薄的薪水。

在文怀沙儿时,家境并不宽裕。在他的印象中,到了天热时,蚊蝇特别多,要先点香熏蚊子,熏完了以后把门关上。

“早上想早起怎么办,那时候闹钟这些东西用不起,就有一个办法,把窗户打开。打开干什么呢?天一亮苍蝇都飞进来了,把你叮醒,不是闻鸡起舞,是‘闻蝇起舞’。”

忆起童年,常常放声朗笑的文老竟说自己曾经是个忧郁的孩子:“我9岁就失眠,我是一个冬天生的小孩,从小就有点忧郁。小小年纪不跟别的小朋友玩。而且我妈妈是一个老病号,每天都熬药吃,我回忆到童年,就像进入一个很阴森的梦。”

“求人不如求己,求己不如求学”,这句少年文怀沙笃信的古话,驱走了阴冷的梦,带他去追寻真诚。他在很小的时候,就开始着迷于一些艰深的、连大人都很少看的书。到了十一二岁时,已能有模有样地背诵《离骚》。儿时莫名的喜爱,悄然引领他走上了学术之路。

虽没有受过正式的学堂教育,但文怀沙早慧,自18岁起就在国立女师学院、上海剧专执教。解放后还曾先后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多所大学任教。

幸福是对痛苦的认识

回首自己走过的近一个世纪岁月,一路上的幸与不幸,文怀沙早已看开。

历数人生坎坷,文老笑道:“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,好事不能让一个人全占了。痛苦未必不是上天赐予的一种特殊的财富。感受痛苦,面对痛苦也不难,难的是在接受痛苦的同时,学会欣赏痛苦。做到这一点需要大彻大悟。祸福相倚,能够欣赏痛苦,人生道

文怀沙

路上必然会坦然面对一切。”

在文怀沙看来,幸福是对痛苦的认识。

在“文革”中,像文怀沙这样耿直、天真的人,总免不了多吃些苦头。尤其是,文怀沙在狱中还患了肝病,经监狱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病。

“那个时候肚子大了,有腹水,做肝穿刺。诊断我为肝癌,医生说活不久了。于是有人有点幸灾乐祸地说,文怀沙你不要吡毛了,活不久了。你晓得不晓得,你是晚期的肝癌!听了这番话,我一开始觉得疼得不得了,然后就突然笑起来了,人家以为我神经错乱了,其实是我理解了人生的痛苦。”文怀沙回忆说,“我这个人怕死,还怕疼,人一旦失去生命,痛苦也失去了。所以,疼得我厉害的时候我高兴,为什么高兴?我还活着!”

于是,他高兴地躺在床上背诵诗书,闭上眼睛把书中内容构思成一幅幅活动画面,配上画面音。旁人以为他在无奈地等死,他却欣喜地发现自己是天才编剧家,兴之所至把唐朝故事串连到宋朝,忙着创造独自闭目欣赏的“电影”,觉得妙不可言。

身体能动弹后,他每天勤奋地扫院子、扫厕所,边扫边背诵《离骚》,沉醉在忘我意境中,直到大汗淋漓。这样过了两三月,肝腹水消失了,病症好转。

医生对文怀沙死里逃生颇感莫名。文怀沙笑道:“医者,意也。我用的是心疗法。外面急风暴雨,我心里一片祥和。”他还用幽默的比喻道出这个秘诀,“内心不要养个汉奸,跟客观世界的不幸里应外合。”

文怀沙一生中经历的坎坷、挫折无数,却依然活得真诚。他说:“一个男人一定要坚强、刚毅、豁达,要充满智慧,